"游牧——定居"连续统：一种游牧社会变迁的人类学研究范式

罗 意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 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愿或非自愿定居使游牧社会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游牧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在游牧社会变迁的研究中，人类学逐渐形成了"游牧－定居"连续统的研究范式，以及在此范式之下的几个核心议题。本文首先探讨游牧社会变迁的三个阶段及人类学对此的研究，然后分析"游牧－定居"连续统的研究范式，并揭示该范式的价值及其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游牧社会；"游牧－定居"连续统；人类学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4)01-0037-05

"Nomadism-Sedentarism" Continuum: A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Change of Nomadic Societies in Anthropology

LUO Yi

Abstract: Nomadic societie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national state and the worl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by settlement projects voluntarily or involuntarily, since 1960s. Nomadic societies experienced expound social change. Anthropologists have carried out many researches, and have formed a mature paradigm named "nomadism-sedentarism" continuum. Under this paradigm, anthropologists focus on several core issu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change of nomadic societies and these correlation studies in anthropology firstly, and then analysis the paradigm named "nomadism-sedentarism" continuum. On this basis, tries to reveal the values and the inspirations of this paradigm to domestic correlation researches.

Key words: Nomadic Societies; Nomadism-Sedentarism Continuum;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Paradigm

"游牧—定居"连续统是当代西方人类学游牧社会研究的一种主导范式，强调面向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进程中游牧社会复杂的、动态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这一范式肇始于对当代游牧社会的深刻变迁及其与外部世界之关系进行解释的努力，初步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之后三十年内不断成熟和完善。本文探讨四个问题：游牧社会在人类学学科发展中的地位，游牧社会被纳入民族国家进程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游牧—定居"连续统研究范式，以及范式的价值及其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

一、游牧社会与人类学

游牧（Nomadism）是人类历史上存在时间最为久远的一种生计方式和文化形态之一。时至今日，非洲、近东、欧亚草原、南亚和北美安第斯山地区一些族群仍以游牧为主要的生计与生活方式。游牧民及其社会文化一直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出现了埃文斯·普理查德、弗雷德里克·巴特等人类学大家。游牧社会的研究成果成为人类学理论与方法革新的思想源泉之一，为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游牧社会的研究中，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作为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的游牧社会发生了深刻变迁，主要表现为传统游牧体系的衰落，社会文化的巨变，以及更深度地嵌入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体系之中。人类学游牧社会研究的关注点也发生了转移，由重构传统游牧体系转向对游牧体系变迁的关注，由强调游牧社会传统组织形态转向强调外在世界对游牧社会之影响和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社会组织、游牧体系、适应、功能、边界、稳定性等关键词逐渐淡出了人类学家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民族国家进程、世界体系、游牧—定居连续统、历史过程等。在西方人类学界，游牧社会变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疆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开发、社区参与和社区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批准号：10YJC850018。

收稿日期：2013-11-21

作者简介：罗 意（1981-），男，重庆长寿人，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讲师，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人类学与牧区人类学研究。

迁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知识谱系，发展出较为成熟的"游牧—定居"连续统的研究范式，并形成了在此范式之下的几个核心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游牧社会经历了"有组织的社会变迁"和定居后"再社会化"的过程[1]，不仅引发了游牧社会深刻的社会变迁，而且还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退化。然而，国内游牧社会变迁的研究多局限于"传统与现代"、"定居前与定居后"的二元论范式，忽略了社会变迁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以至于难以对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交织及其互动展开深入分析。因此，国内游牧社会变迁之研究也应转向复杂动态过程，而"游牧—定居"连续统无疑是一种值得借鉴的研究范式。

二、地方、国家与世界：游牧社会研究的三个阶段

按照哈扎诺夫的观点，游牧经济本质上是非自足的，必须与外在世界保持各种关系以获得重要资源。[2]因此，从来不存在一个封闭的游牧社会。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被纳入民族国家体系之前，游牧社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20世纪60年代，游牧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在民族国家进程中逐渐丧失，游牧社会也被纳入了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之中。与此同时，人类学游牧社会变迁的研究也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分别是地方体系中的游牧社会、民族国家进程中游牧社会的变迁，以及世界体系对游牧社会的影响。

（一）地方体系中的游牧社会

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是早期人类学游牧社会研究的典范。将努尔人分枝性社会结构与其所处生态环境、生计与生活方式联系起来，阐明了生态环境、生计、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结构功能关系。[3]实质是认为游牧社会是一个对外有固定边界，对内通过不同要素的功能关系构建和维系的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

这一研究范式在20世纪50~60年代被新功能主义所修正，代表人物包括弗雷德里克·巴特、布雷恩·斯普纳、菲利普·萨尔孜曼等。巴特在对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地区[4]的相关研究中首先引入了族群关系这一变量。在一个小生态环境中，巴坦人、科希斯坦人和古吉拉人差异性与互补性的经济生产模式建构了族群的共生关系。共生关系不仅影响着族群的经济生产模式，也维系着游牧民和季节性游牧民社会结构的稳定。斯普纳[5]、萨尔兹曼[6]对伊朗南部俾路支游牧民与萨哈瑞农民关系两种形式的深入研究揭示出维系共生关系的要素并非经济生产模式，而是族群间的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政治结构调节着族群间生计、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矛盾和冲突。在新功能主义的研究中，内部不同要素的结构功能关系仍很重要，但认为游牧社会是地方系统的一部分，而族群的共生关系维系着地方系统与游牧社会的稳定。

拉达·哈德森和内维尔·哈德森指出"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都受到功能主义的主宰——强调地方系统的边界和稳定性，这意味着对游牧社会的描述总是试图重构传统的社会组织"。[7]此类研究主要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地方系统的边界与游牧社会的稳定性，而忽略了外部经济、社会与政治条件的影响，这导致不可能对游牧社会正在发生的变迁展开深入研究。

（二）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游牧社会

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意识到游牧社会是区域和国家系统的一部分，强调农业社会、国家或殖民机构对游牧社会的生存空间与社会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两种重要的研究趋势。

第一种趋势强调游牧社会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萨尔孜曼指出"部落民、农民和城市居民不能作为一个自在的分析单位。每个群体的适应和经济体系都是与一个社会内其他社区密切关系的结果。对游牧社会的研究必须将之置于与农业社会、城市社会、国家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背景中进行分析"[8]。俾路支游牧部落被纳入国家体系后，游牧民被禁止抢劫农业村落，取而代之的是政府通过机械化的灌溉工程和各种扶持政策鼓励游牧民转向定居农业。[9]游牧民的移动也受到更严格的限制，营地选择日益受到城镇与农业中心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牧民参与到了劳动力市场之中。[10]

第二种趋势关注国内政治经济进程对游牧社会的影响，主要围绕国家直接或间接干预游牧社会，以及引导游牧社会实现发展和现代化的努力所导致的生态退化、社会冲突与游牧社会的边缘化等问题展开分析。

国家首先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对游牧社会的游牧体系、生计与生活方式进行直接干预。索马里1975年的土地改革，国家机器和商业化的农业组织获得了土地的优先权，小农只有很有限的权力，而牧民没有获得任何权力。1973年的国内法废除了传统氏族、宗族控制或占有土地和水资源的权力，这导致游牧业的再生产日益困难，以及环境退化、地区冲突等棘手问题。[11]在玛莎曼迪与巴斯·萨拉姆看来，二战后游牧业与其说是一种经济适应，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适应——解决游牧业存在问题的方式与其说是经济的，还不如说是政治的。如贝都因人都已定居，但变迁的动力既来自经济力量，也有来自政府的政策。但不管是哪种力量，都表明国家在游牧社会中权力的增大。[12]

国家也通过间接的发展政策、市场经济的力量来推动游牧社会的变迁。外在于游牧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项目导致秘鲁安第斯山高地牧业社区更多地卷入市场经济之中，并逐步被转化为农民社区。在农民社区中出现了新的劳务工资关系，社会内部分化加剧和生计多元化等现象。[13]人类学家发现，世界范围内的游牧社会都经历了农业扩张至干旱区持续加剧的影响，城市移民和牧民定居的影响，以及深度参与到市场经济——包括产品大规模售出和劳动力无产阶级化——的影响。这些进程在类型上各不相同，但又彼此联系，对牧民有着各种不同的影响。[14]

直接干预和间接推动往往交织在一起，通过定居、土地制度变革实现对游牧社会的有组织改造，又通过发展政策和市场经济引导游牧社会选择其他生计与生活方式，逐步使游牧社会融入到民族国家体系之中。

（三）世界体系中的游牧社会

1997年，艾纽特·弗拉勤对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游牧社会的研究文章做了梳理，发现相当大的一部分文章关注政治和经济变迁。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游牧社会的研究有从文化生态学转向政治生态学的趋势，更加关注国际资金、国家政府在游牧区域发展努力带来的结果。三项相互联系的内容主导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游牧系统的生态适应性、

支配的问题和与农业国家的关系问题,以及在游牧人群中的国际发展政策的影响。"[15]在凯瑟琳·加尔文看来,游牧系统的变化源自草原的碎片化与气候变迁和气候的多变性。而草原碎片化又是由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所引发,包括:土地制度、定居农业和社会制度的变化。而且,气候变化和气候的多变性在很大程度上又由草原碎片化所引起。[16]

引发变迁的力量并非总是源自游牧社会和其所在国家,它们大多是西方发展政策与意识形态实践的结果。巴菲尔德认为,政府和国际组织不断施压,旨在使牧业资源更多地满足国内需求和出口的需要。这给游牧社会带来了三个基本问题:首先,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权力转换使得游牧民为中央集权的定居人群所主宰,在与民族国家中其他群体的竞争中似乎也不具备任何优势;其次,为了在现代世界生存下来,游牧民必须以各种方式做出改变;最后,因对游牧经济的有效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的质疑,以"公地悲剧"假设为前提,游牧民被视为环境退化的始作俑者。[17]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导致了游牧体系的瓦解,游牧民被迫转向集约农业,并更深入地卷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加尔文悲观地指出,"牧业发展的机会相当之小,大多数牧业社会面临的风险正不断增加"。[18]凯若琳·汉弗瑞与戴维·史尼斯通过中亚地区的俄罗斯、蒙古、中国三个国家的草原生态区的比较研究,总结出全球化时代游牧社会面临的几个普遍性问题:首先,草原的退化与放牧体系流动性的丧失密切相关;其次,大规模的集体性制度安排是保持"流动性"重要的制度基础;第三,以提高牲畜单位产出率的定居圈养模式,必然给草原带来高强度的压力;第四,牧民同样渴望着城镇化的现代生活,但城乡一体化进程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第五,中亚草原区域的发展正显示出明显的"极化"过程,亦即草原区域成为依赖中国和俄罗斯的中心区域的政治与经济边陲,而在此过程中其有利于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性知识"也受到污名化的贬损;最后,与草原生态特点相契合的地方文化的衰微与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19]

总之,人类学游牧社会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地方与民族国家的地理与政治边界,更多地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变迁、发展、生态环境退化与游牧社会的边缘化等重要议题。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重点分析五个层次及其勾连:游牧社会传统的生计与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与文化,国家的发展政策及其影响,意识形态与世界体系之影响,以及游牧社会对这些影响的反应。

三、游牧——定居连续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将地方系统、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的影响,以及游牧社会对影响的反应融于微型社区的研究范式——"游牧—定居"连续统,并在之后30年中不断发展和成熟。此范式着重分析定居牧业社区的生计、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与环境的动态关系。"游牧—定居"的过程被分解为游牧、半定居、定居和定居后四个阶段,探讨不同阶段的变迁与延续。为实现这一目的,研究者选择不同阶段的牧业社区进行比较,核心议题有三个:定居的动力与过程,生计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演变。

(一)定居的动力与过程

理查德·斯曼斯科等人在1975年对游耕、游牧和游商群体由"移动到定居"的三个发展阶段做了分析,提出了"三阶段理论"。基本观点是"在现代化和发展政策的影响下,游牧民经历了地方系统逐渐被整合进地域系统、国家系统的过程。"[20]琳达·斯怀德认为:游牧与农耕是一个连续统,部落政治组织和土地制度决定了巴基斯坦布拉灰人由游牧到定居的转变。[21]弗拉勤等人在对肯尼亚北部朗迪耶游牧民的研究中发现定居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应对来自牧业经济的推力,以及城市与农业生活的拉力所致。牧民因为农业和牧业人口增长导致失去土地而转向定居,商业化的农场和牧场,以及旅游公园的扩张也是重要因素。[22]

如斯曼斯科所言,在几乎所有定居的个案中"外部行政力量的政治控制被强加进来。官僚机构认为定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可以使牧民成为更好的公民,可以对国家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23]这些研究揭示出定居是国家控制和改造游牧社会的主要方式,反映了国家视游牧为落后生计与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不仅是为了实现发展和现代化,也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地理与政治边界,构建超越部落的国家认同。

(二)牧民生计与生活方式的变化

定居带来了牧民生计与生活方式的转变。转变具有多层次性,并产生了各种有利和不利影响。在秘鲁安第斯山区游牧社区变迁的个案中,研究者发现国家一直迫使牧民定居以创造农民社区。在这个过程中,牧民坚持一种生计多元化的策略,并将有限的家户经济与劳务经济结合起来,被迫更多地参与到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越来越多的牧民选择劳务性工作并移人城市,在家户内形成新的经济分工,导致了家户生计的多元化。[24]这表明生计的变化主要来自政府定居政策的影响,但牧民对新的政策的适应和生计策略的选择同样重要。

在一项有中国学者参与的对西藏游牧社会变迁的研究中,研究者注意到由传统的游牧向农牧兼营的转变涉及到多个层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永久性农业的出现,定居的村落生活,与前两者相关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移动空间的减小,资源条件的恶化,生态环境的退化,食物生产的增加,以及各种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出现。[25]在朗迪耶游牧民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定居对儿童饮食结构、健康状态和成长过程产生影响。有利影响包括饮水、教育、健康和市场经济条件的改善。不利影响则是在新形成的定居社区中儿童营养条件的下降,而主要原因是饮食结构的变化所致。这一现象通过同龄组中定居社区与传统游牧社区中儿童身高和体重差别的比较得到验证。同时,牧民定居也增加了因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各种绝望情绪。总体上看,定居的有利影响似乎并未超过不利影响。[26]

每一层面的变化都可能对其他层面产生新的影响,进而对游牧体系与社会文化结构产生影响。因此,不仅需要分析发生了哪些变化,还要分析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变化之间的链式反应。这些反应包括:与土地、国家和市场体系更密切的联系,阶级或阶层系统、非公平性和社会两极化的出现,集体主义向个体主义的转变,部落制度的崩溃与核心家庭重要性的凸显等。

(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

生计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必然引发人口结构的变迁。这一领域是最令人类学家头疼的,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游牧社会详尽的、长时段的人口统计资料。但是,人口结构对理解游牧社会结构、生计与生活方式,以及牧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又极为重要。阿文隆·梅尔以人类学家关于非洲和中东游牧社会的研究资料为基础,运用跨文化比较方法,借用人口转型理论,建构了一个"游牧—定居"连续统的人口分析范式,具有开创性意义。

阿文隆·梅尔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生产模式变化导致的社会转型对人口结构和人口再生产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游牧—定居"连续统中,衡量人口结构的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三项指标经历了"低、高、低—高、高、低—高、低、高—低、低、低"的转变,其实质是人口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27]出生率的上升主要源自社会现代化过程和定居农业的生计与生活方式。家庭或个体冲破部落或血缘群体的羁绊,通过土地、国家和市场经济体系中理性化的行为实现发展。在这一时期,财富由子辈流向父辈,孩子具备了工具性价值,进而促使人们生育更多的孩子。同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带来了死亡率之下降。两者相平衡,就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着定居的进程而上升。这一过程通过11个游牧社会"游牧—定居"转变过程中人口翻倍周期的变化得到印证。定居牧民人口翻倍的周期为12.15~31.5年,这一数字远低于半游牧民的63.01~16.11年和半游牧民的63.01~23.1年。[28]定居后一段时间,子女边际效益下降,财富由父辈流向子辈,人们的生育行为趋于理性,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随之下降,形成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现代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对牧民与草原资源、环境的关系产生影响。然而,是否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原的退化,或者说过度利用与草原退化的程度,则与国家宏观的人口与经济政策相关。里卡多·F. 纽伯特发现蒙古国环境退化比蒙古轻,原因在于蒙古国牧区增长的人口为"乡村—都市"的移民浪潮所消解。这与中国严密的户籍制度和对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造成牧区人口过快增长、超载过牧和草原严重退化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口变化对环境的影响通过宏观经济变化,尤其是制度因素和农业因素表现出来。[29]这意味着,定居后的各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地产生新的影响,并且只可能在相应的社会情境中才会发生。

(四)范式的发展

"游牧—定居"连续统的研究范式有三个基本结论:首先,游牧向定居的转变并非定居前与定居后两阶段论设想那样简单,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呈现出阶段性和动态性特征。转变给游牧社会既带来了有利的影响,也带来了各种消极影响,但转变本身并不就意味着"发展";其次,定居不仅应被视为国家改变游牧社会落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所做的努力,也应被视为国家控制和改造游牧社会的重要方式,并有着创建新的国家认同的目的;最后,转变伴随着生计与生活方式、人口与社会结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变化,而且各种变化之间存在链式反应。

范式也存在两个严重的缺陷:首先,在一个微型社区中,游牧社会所处的生态环境与资源条件、生计与生活方式、社会与人口结构、牧民行为等因素究竟如何与外在的意识形态、国家制度、政策、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产生关联,它们又如何推动了社会变迁;其次,范式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游牧社会的社会文化结构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如何影响社会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成熟的政治生态学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提供了方案。一是,将生计与生活方式、社会与人口结构、资源与环境视为内部关系链,视国家的制度、政策、社会经济条件和意识形态为外部关系链。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牧民决策模式,并将之作为内外关系链的桥梁,从而在"游牧—定居"连续统范式中引入了内外互动的机制;二是,强调外部链体现了与游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探讨不同社会文化体系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以及游牧社会的社会文化结构之变化,从而完善了"游牧—定居"连续统的范式,也增强了范式的解释力。[30]

"游牧—定居"连续统是一种典型的过程研究范式。必须指出的是范式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由强调动力、生计与生活方式,逐渐转向过程中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变化和牧民的决策模式,再引入政治生态学链式解释路径和社会文化体系的碰撞与交融将之转化为一个政治与社会文化过程。正如社会变迁是连续性过程一样,"游牧—定居"连续统范式也具有连续性,并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四、范式的价值与启示

综上所述,自愿或非自愿的定居使得游牧社会相对的独立性逐渐丧失,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三方面因素导致了变迁,它们是:外在于游牧世界的国家与世界体系的力量,游牧社会内部各要素的链式反应,以及游牧民应对这些变化的反应和策略。急剧的社会变迁击中了传统功能主义范式最薄弱的地方——对平衡的系统、社会的内部稳定以及永恒结构形象的强调使其不能平等地对待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31]解决之道是在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的场域中探讨和分析游牧社会的各种变化,形成了"游牧—定居"连续统的研究范式,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融合了传统功能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为研究游牧社会的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游牧社会中各要素之间和小生态环境中族群间的结构功能关系分析是基础,外部力量对内部要素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链式反应是解释变迁的具体路径;其次,强调社会系统的运作、不同因素的交织与互动和牧民的决策模式,从而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变迁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过程,也超越了传统与现代、定居前与定居后的二元论范式;最后,为处于变迁之流的游牧社区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有助于研究者把握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情境中微型社区的复杂动态变迁过程。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游牧社会普遍经历了定居引发的社会变迁和定居后再社会化的过程。我们认为,定居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具有普遍性特征。"游牧—定居"连续统的研究范式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当代中国游牧社会变迁的过程,提供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首先,从结果分析转向过程分析。国内相关研究多以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论为基点,描述当代游牧社会的现状,并将之与"传统"游牧社会做比较,探讨社会变迁的结果及表现形式。此类研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回答变迁是如何发生

的,也即是变迁的生成机制问题;第二,忽略了游牧社会变迁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以至于忽略了情境中的影响要素及其互动机制。将视角由结果转向过程,研究者就可以对变迁的情境、动力、因素、因素之间的互动等做出解释,并探讨游牧民适应变迁的策略,进而揭示当代中国游牧社会变迁的生成机制。

其次,推动跨学科合作研究。国内对游牧社会变迁的研究仍然局限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文化体系、游牧的适应性等问题上,很少关注人口、资源、环境、疾病、游牧体系与国家体系的冲突等问题。这导致我们对游牧社会变迁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某些特殊问题和某些现象的描述上,很难处理和解释变迁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实际上,在游牧社会融入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很多复杂性问题超出了人类学给予我们的理论与方法。国内相关研究亟需综合地理学、生态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或是与其他学科研究者进行合作以实现对变迁的多层次阐释。

最后,从现象性的描述转向理论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在牧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如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丰富的、不同时段的田野调查资料。这些资料为从一个较长时段探讨"游牧—定居"转变的过程及由此引发的深刻社会变迁提供了基础性材料。以此为基础,选择一些曾经调查过的社区做深入的民族志研究,建立起多个典型个案。费孝通先生提醒我们,要建立类型,然后在类型基础上进行比较,才有可能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32]牧区社会变迁的研究也是如此,也要根据民族与区域差别建立类型,在此基础上运用跨文化比较方法,不仅可以验证、修正或批判国外研究范式的不足,也可以构建足以解释中国游牧社会变迁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崔延虎.游牧民定居的再社会化问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4).

[2]Anatoly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Second E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

[3][英]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M].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Fredrik Barth,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Ethnic Groups in Swat, North Pakist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 Vol. 58, No. 6, 1956.

[5]Brain Spooner, Towards a Generative Model of Nomadism,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 4, No.3, 1971.

[6]Philip C. Salzman, Adaption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Iranian Baluchistan, Ethnology , Vol. 10, No.4, 1971.

[7]Rada Dyson -Hudson and Neville Dyson -Hudson, Nomadic Pastoralis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 Vol. 9,1980, p15.

[8]Salzman, P. C. 1978, The study of 'complex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a review essay. Int. J. Middle East Stud , 9.

[9]Philip Car Salzma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aluchi Trible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4, No.4, 1973, p428~429.

[10]Philip Car Salzman, Pastoralism Nomads: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 Based on Research in Ir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Research, Vol. 58, No.2, 2002, p257.

[11]Unruh, John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genous Pastoralist Resource Tenure and State Tenure in Somalia, GeoJournal, 36.1, 1995.

[12]Gideon Kress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Nomadic Society in the Arab Eas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5, No.4,2003.

[13][24]Julio C. Postigo & Kenneth R. Young & Kelley A. Crews,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Pastoralist Community in the High Peruvian Andes, Human Ecology, (2008) 36.

[14] [15]Elliot Fratkin, Pastoralism: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Issu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6 (1997), p246. 236~237.

[16][18]Kathleen A. Galvin, Transitions: Pastoralists Living with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9. 38,p185. 193.

[17]Tomas J. Bardield,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Prentice Hall, 1993, p207.

[19]荀丽丽."失序"的自然:一个草原社区的生态、权力与道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6~7.

[20] [23]Richard Symanski, Ian R. Manners and R.J. Bromley, The Mobile -Sedentary Continuum,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65, No.3, 1975, p464. 468.

[21]Ninda Swilder.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Brahui Sedentarization, Ethnology, Vol.12, No.3, 1973.

[22][26]Elliot Fratkin, Eric Abella Roth, and Martha A. Nathan, Pastoral Sedentariz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Children's Diet, Health, and Growth Among Rendille of Northern Kenya, Human Ecology, Vol. 32, No. 5, October 2004.

[25]Jianchu Xu, Yong Yang, Zhuoqing Li, Nyima Tashi, Rita Sharma, and Jing Fang,Understanding Land Use, Livelihoods, and Health Transitionsamong Tibetan Nomads: A Case from Gangga Township, Dingri County,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EcoHealth, 5, 2008.

[27]Avinoam Meir,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A Neglected Aspect of the Nomadism -Sedentarism Continuum,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 11, No. 2, 1986,p201~202.

[28]Avinoam Meir, Comparative Vital Statistics Along the Pastoral Nomadism-Sedentarism Continuum, Human Ecology , No. 1, 1987, p100~102.

[29]Ricardo F. Neupert, Population, Nomadic Pastoralism and theEnvironment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Volume 20, Number 5, May 1999, p414.

[30]Paul Robbins, Political Ecology: Critical Introductions Geography, Blackwell Pyblishing,2004.

[3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65~166.

[32]费孝通.费孝通社会学文集·社会学的探索[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77~78.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马 伟]